

尺素寸心

——关于唐吉慧先生编《陈伯吹书信集》

■ 陈佳洱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父亲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由于上海的冬天没有暖气,每年冬天父母都要到北京来过冬。父亲的行李箱里有一半都是信件,这些信件是他在上海时来不及回复的,也是他到北京后要做的功课。

父亲对于回复读者、作者的信件十分认真,这是他从从事教师、编辑、作家工作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来信的是小学生、中小学教师,还是作者或出版行业的领导,他都热情洋溢地回信,从不敷衍。

从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大夏大学半工半读,兼职做幼儿师范的教师,同时应北新书局的邀请担任《小学生》半月刊的主编开始,66年中,他回复读者、作者的信件估计有数千封之多,由于年代的久远,很多信件都已经无从查找。此次由年轻的宝山同乡、散文作家唐吉慧先生多方搜集,汇集在这本书里的信件有150多封。这些信件的收信人有中学生、家长、教师、业余作者、著名作家、出版社同事、作协领导等等。所收录信件的写信时间从1945年到1996年,其中有1949年至1951年致常君实的毛笔信五封,十分珍贵。

每一封信件都有一个故事,特别是一封给他终生的朋友、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才先生的。父亲和李楚才先生的友谊真挚又深厚,他本人是教师出身,所以喜欢交教师朋友。1972年他从上海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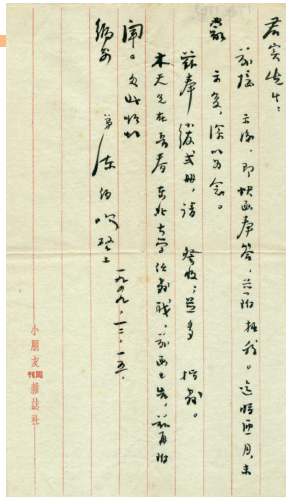
▲陈伯吹先生与孩子们在一起。

区奉贤“五七干校”回到上海不久,就和李楚才先生延续了友谊,每周六晚饭后,他慢慢地步行到李楚才先生家,两位老朋友便开始交流。

写于1948年4月17日的信件,是写给《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投稿的业余作者张启钰的。张启钰那时正在英国接受水兵培训,他给《现代儿童》副刊寄来稿件,请英国小朋友和小朋友给《现代儿童》写信,介绍英国儿童和水兵的生活,并寄来200多张画片和明信片。张启钰回国后是“重庆

号”上的水兵。我父亲曾写信给他,劝他“良禽择木而栖”,意思是要他脱离国民党军队,选择到人民一边。张启钰后来参加了“重庆号”的起义,他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的27名成员之一。

对孩子的爱贯穿于父亲的一生。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回复一位初中学生周彦菁的,小读者在来信中倾诉了对升学问题的苦恼,父亲写了一封1400字的信,如同一位教师对学生谆谆诱导,鼓励他“挺起胸膛,正视前方”,“迎上前去,思索它,分析它”,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陈伯吹致常君实信札。

一个初中即将毕业的孩子既指出了要改正的缺点,又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并引用了古贤邵康节先生说过的话:“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际在于春,一生之际在于勤。”要周彦菁同学好好安排时间,锻炼意志和毅力,勇往直前,取得进步。

另外,父亲也曾给1981年获得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比赛金质奖章的赵爽同学写过十几封信,鼓励她在文学上继续努力,争取做一名儿童文学作家。这次吉慧通过《中国新闻周刊》社黄卫得

到了赵爽的通讯方式,并联系到了已经定居德国20多年的赵爽,可惜她由于数次搬家,这封信没有被保存下来。

1977年,儿童文学界开始拨乱反正,文学艺术的春天到来了。在这期间,父亲有给儿童文学女作家臧向真的信件六封,时间从1978年到1990年。父亲的信中对臧向真的新作《酒井》《枫叶红似火》《海的童话》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这位女作家在停笔10年后一举写出相当出色的篇什十分称赞。父亲在这文学艺术春天到来的日子也争分夺秒地做了很多工作,他在给臧向真的信中写道:“我在这冬到春,也在《光明日报》《读书》《儿童文学研究》发表了带有理论性的文字。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散文”,为《《中学生》写了关于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的短文”,又“写了一篇小说,《榕树》准备采用”,“此外还被约写童话、评论等短篇,以故手头也没空,会议、活动也不少”。1979年10月,父亲和臧向真都参加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他们在北京相遇,一定都为终于雨过天晴,可以为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大干一场而无比兴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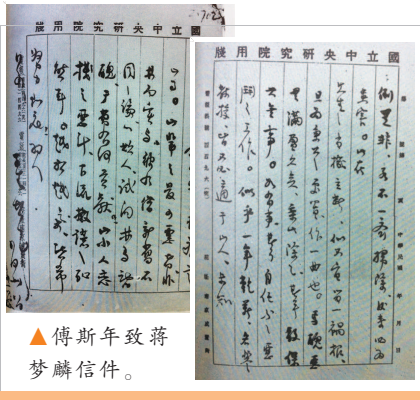
感谢唐吉慧先生做了那么好的工作,让我们能看到父亲70余年写作生涯中工作轨迹的一瞥,这些信件对于研究父亲的一生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以此书信集为开端,相信会有更多父亲的书信被发现、被研究。

最近翻看以前订阅的《读书》杂志,看到2014年第六期刊载陈福康的补白文章《关于“与”字》,文不长,兹录如下:

《读书》今年第五期“读书献疑”栏发表朱正先生的《〈傅斯年全集〉里的一封信》,指出《傅斯年全集》把“马”错认作“与”,致使一封信无人能看得懂。这确实是大不应该发生的事。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朱先生的。不过,朱先生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傅斯年的手书再怎么潦草,也不会写出简体的‘与’字来的”,我则认为不对。因为我平时看过不少明清人士的稿钞本,知道古人常写出“与”字来。记得鲁迅手稿中也是有的。翻一翻许慎《说文解字》,也有:“与,赐予也。一勺为与,此与與同。”说“与”是“赐予”的意思,那么在表示“和”“同”的意思时能不能用这个“简体”呢?这里的“此与與同”的“与”字用的就是这个“简体”。

朱正在《〈傅斯年全集〉里的一封信》中谈的是傅斯年1934年4月28日致信胡适谈北大文学院国文系开除旧派教授林损的事情(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此信被收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全集编者将信中关键性的“马”(指北大国文系主任马幼渔之姓)判读为“与”。陈福康认为傅斯年是可以写出简体“与”字,其证据是明清人士稿钞本常写“与”字,又引用鲁迅手稿与《说文解字》。这种说法无论从逻辑还是实证的角度都值得商榷,进而言之,还关涉现代学人书信识读问题,不可谓不重要。

傅斯年信中言及的林损辞职事件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报纸为之报道,马叙伦、刘文典、刘半农、废名、黄侃、朱希祖、钱玄同等都有评论。旧派教授林损被开除主要是当时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意思,且北大校长蒋梦麟也予以支持。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中国文学系的大改革在于淘汰掉一些最无用的旧人和一些最不相干的课程。此事还不很彻底,但再



▲傅斯年致蒋梦麟信件。

过一年,大概可以有较好的成绩。”关于林损辞职事件,傅斯年知晓事情来龙去脉,也参与了此事。而且当时蒋梦麟能大刀阔斧进行人事改革,傅斯年、胡适就是其重要倚靠。傅斯年1934年4月28日致信胡适,一方面表示对林损、马幼渔等人的厌恶,一方面也是支持胡适裁汰旧人。参与此事的胡适、傅斯年当然对北大国文系的人事关系相当了解,而且胡傅二人相知颇深,对于收信人胡适而言,当不存在“马”“与”分不清,更不存在弄不清傅斯年信件的意思。更进一步说,傅在1934年5月8日给蒋梦麟的信里,“马幼渔”的“马”字写得很清晰。4月28日信“此辈之最可恶者,非林而实马”这句话细看,傅也并没将繁体“馬”写成简体的“与”,只是繁体“馬”的上半部分傅斯年有所简写,这对收信人阅读不构成障碍。之所以会引起后来释读者“馬”“与”的误解,还是傅斯年写字潦草。这是其一。

其二,据王汎森在《傅斯年遗札》的序言言及傅斯年信稿中好用通假字、惯

也说“与”字

——谈傅斯年书信识读问题

■ 朱洪涛

字。在该书的编辑凡例中整理者归纳了不少这样的案例:

第一,当时的通行用语。如“很”与“狠”,“氧氣”与“養氣”,“磋商”与“措商”,“脾氣”与“皮氣”,“分布”与“分佈”,“賬簿”与“帳簿”,“甚麼”与“甚末”与“什末”等。

第二,傅斯年自称的同音假借字和个人惯用字。如“材料”作“才料”,“不沾”作“不沾”,“最初”作“最出”,“功能”作“工能”,“力量”作“利量”,“切勿”作“切忽”,“塌台”作“榻台”,“长久”作“常久”等,这一类情况最多。

第三,两字交相互用情况。如“拿”与“那”,“稀”与“希”,“底”与“低”,“象”与“像”,“反”与“返”,“到”与“倒”,“辩”与“辨”,“效”与“効”等。

《傅斯年遗札》的整理者将此种情况一例照旧,对明显为错字、衍文等情况出了脚注。笔者以为从保存文献的角度出发,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傅斯年本人也不讳言自己使用所谓的同音假借字。1939年6月13日傅斯年给任鸿隽信:“近来精神颓衰,连篇白字(所谓同音假借,一笑!),此信匆匆付邮,不知有多少,不及检正,以后恐亦不免有此毛病,乞谅之。”傅斯年虽然运用这些“小玩意”再加之字迹潦草,但并非不可辨识。他在1934年致吴丰培的信就明言:“上次所登芜函,错字之多,不可想象(引者注:指报纸登出未经校对,产生错讹)。弟字虽潦草,然若干处可以上下文识之。今登出者乃有绝不可解者,区区一信,至于如此,甚矣校字之未易也。兹附一表乞投函《晨报》更正之,又十三日信亦恐潦草致误,另请人清抄一份送

上,备执事投稿之用。”所以,若不明白傅斯年书信写作中这些“机关”,我们大概会认为傅斯年爱写错别字。

由此看出,这不是傅斯年将繁体“馬”写成“与”的错误而是关涉现代史料的判读方法问题。大概而言,傅斯年的信札分为公文、电稿、私信、明信片等类别,在私信中傅的字迹的确不好辨认,其原因主要是字迹潦草。另外,傅斯年的信件写作往往随时间、地点、心境、情势的变化而变化。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等资料看傅斯年的信笺、字体、用笔都有不同,有的极度潦草,有的是规整楷书,有的是“今草”,还颇有章法,呈现一种书家的味道。尤其在熟朋友之间,傅斯年更是纵笔抒写,意思也就在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心照不宣。所以我们在阅读傅斯年信件时,要区分哪些是别字,哪些是傅斯年自造的“今典”,不妄改,不比附,这样才能减少偏差,还它本来面目。笔者认为,现代学人在日记、书信等私人性质的写作中通常有各自的书写策略,若不谙识这些“今典”,就会看朱成碧,谬以千里。这同时提醒我们对现代史料的阅读需要老吏断案那样精审与慎重。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中华书局2017版《傅斯年全集》已将朱正指出的这个问题纠正过来了。

道歉声明

《文匯讀書周報》2018年12月3日刊出的《点滴凡事里的杨绛》一文,系摘录我近日所出版的《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一书。我未得到杨绛先生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擅自发表她的书信,侵犯了杨绛先生的著作权,深感愧疚,谨此诚恳声明道歉,并保证今后决不发生这种情况。 李景端 12月4日